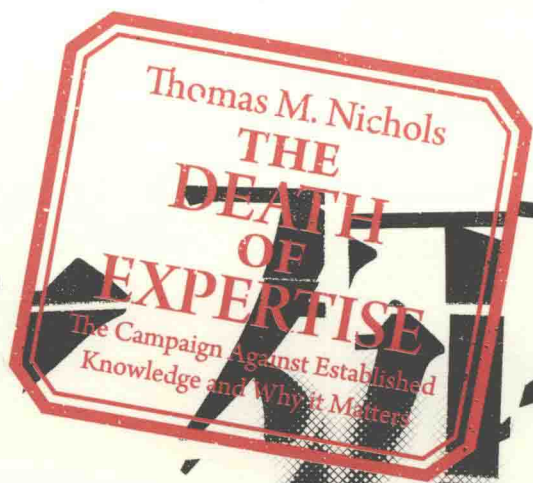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专家之死



专家之死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Thomas M. Nichols

专家之死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 托马斯·M. 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著;舒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 The Death of Expertise
ISBN 978-7-5086-9690-4

I. ①专… II. ①托… ②舒… III. ①文化研究—美国 IV. ①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686号

The Death of Expertise by Thomas M. Nichols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Death of Expertis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著者:[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Thomas M. Nichols)

译者:舒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435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690-4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

专家夫人琳恩·玛丽·尼科尔斯

(Lynn Marie Nichols)

和天下无双的女儿霍普·弗吉尼亚·尼科尔斯

(Hope Virginia Nichols)

序

“专家之死”这种说法一出现，一种傲慢自负的感觉已经呼之欲出。启用这样的标题简直是勇气可嘉，很多人还没翻开书，光看标题可能就已经产生了疏离感；有些人读了，可能恰好发现书中的错误，拿来杀一杀作者的威风。我理解这种反应，因为当我看到这种一刀切的论调时，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活就是习惯于把一切重要的事物过早地埋葬：羞耻感、常识、男子气概、女人味儿、好品位、智识等等。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去讴歌那些尚未消亡的事物。

比如专家。专家未死，但岌岌可危。有些事真是错得离谱。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诚然，普通人对科学、政治或地理知之不多，这是个老问题了。而且，说实在的，放在当今社会，这都谈不上是个问题了，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分工明确，人们无须通晓一切，飞行员开飞机，律师打官司，医生开药方，各司其职。我们谁都不是达·芬奇式人物，可以早上画《蒙娜丽莎》，晚上设计直升机。社会理当如此。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以无知为荣。美国人已经到了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知。拒绝专家的意见，就是在维护个人的自主权，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日渐脆弱

的自尊心，隔绝外界的纷扰，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你错了。这是新的“独立宣言”¹：我们不再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所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包括那些错误的理论。一切都是可认知的，关于一个主题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分伯仲的。

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万事通，但这和专家是两码事。我是一个教授，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喜欢教授。大约30年前，我刚刚开始教书生涯，在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大学任职，所以我会时不时顺道去我哥哥的一个小酒馆，跟他打个招呼。有一天晚上，在我离开之后，一个顾客对我哥哥说：“他是个教授，哈？嗯，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如果你是我的同行，应该对此已经习惯了。

但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些知识分子听到别人挖苦知识分子无用就怒不可遏，那你们应该换个行当了。我当过教师和政治顾问，给政府和企业做过主题专家，也在多个媒体担任过评论员。我习惯了别人与我意见不一，事实上，我鼓励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一个民主社会智识健全、生机勃勃。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忧。我们失去了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放。我没有活在中世纪，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前所未

1 美国《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译者注

有的，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真是闻所未闻。

这并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一点。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就发现人们有多好为人师，即使只是闲聊，在谈到很多话题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教导我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领域——军备控制和外交政策。（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他们应该……”）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是个经验丰富的专家，但还是对此感到瞠目结舌，这些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却信心十足地告诉我，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美苏之间的和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是欢迎论辩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全球毁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人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以为这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做事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我接受了。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其他政策领域的专家也有同样的经历，总有外行读了为数不多的关于税收、预算、移民、环境或其他课题的研究，就要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如果你是一个政策专家，这种事情如影随形。

然而，再到后来，我听说一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也有同样的经历。而且，有很多专家的建议明明不易反驳，但也未能幸免。最让我震惊的地方不是病人或客户会问到敏感问题，而是这些人有多积极地告诉专家，为什么那些专家建议是错的。他们几乎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专家其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诚然，人们排斥专业知识，但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皆是如此，而且三天两头这样，还带着一腔愤怒，这就让我觉得异乎寻常了，这才是更糟糕的地方。由于互联网无处不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不受约束，或是 24 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需求，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就更为明显了。但是，这股排斥专业知识的新兴风潮里透着一股自以为是

和狂热，而且，至少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怀疑或质疑，或为了寻求替代答案，而是一种自恋，伴随着对专业知识的蔑视，还美其名曰自我实现。

所以，专家想要还击，要求人们恢复理智，就难上加难了。不管涉及什么主题，所有的争辩都会随着一颗愤怒自大的心付诸东流，最终人们还是会坚持己见，有时候还殃及职业关系，甚至朋友关系。现如今，专家不应争辩，而是接受这种分歧，大不了，就当是坦诚的意见相左。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个词现在充其量就是个争吵的灭火器，而且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对错……那我们简直太蠢了。

我想，我可能见证了世代交替。我成长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对专家敬若神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国际关系，美国都是执牛耳者，那真是个让人陶醉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是知识渊博的，但没受过什么教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人，很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对的。我并非成长在一个绝对服从权威的环境里，但总的来说，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对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从足部医疗到政治，都是深信不疑的。

正如一些批评家对专业知识所指出的，那个年代，我们既相信把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送上月球静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¹的人，也相信把众多无名的美国人送到越南溪山（Khe

1 静海，是月球上众多“月海”中的一个。所谓的月海，并非月球上的海洋，而是指肉眼看到的月面上的暗淡黑斑，其实是月球上广阔的平原。人类在静海最早的探索于 1965 年开始。此地区是乘坐“阿波罗 11 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登陆月球的地点。——译者注

Sanh)¹和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²的人。公众对专家和政治领袖的信任，不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他们说得对。

但是，我们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专家不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我们对这些“书呆子”嗤之以鼻，我们告诉家庭医生该开什么药，或是跟老师争辩，就算孩子在测试中的答案是错的，也坚持说是对的。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一代人。

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很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我深表感激，同时，还有更多人可能与本书的观点和结论有交集，也请见谅。

早在2013年的时候，我在个人博客“作战室”(The War Room)上写了一篇题为“专家之死”的博文。《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的西恩·戴维斯(Sean Davis)注意到这篇博文，并与我联系，让我整理出一篇文章来。我很感谢西恩和《联邦党人》给这篇小文一些版面，让它很快走入了世界各地100多万读者的视线。随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麦克布赖德(David McBride)看到这篇文章，遂与我联系，要把此文的主旨思想编纂成书。他在编辑上给予的指导和建议令我受益匪浅，让我能用更详细的内容来充实论证，我很感激他和牛津，以及为书稿做审校的人，是他们让这本书得以问世。

1 溪山战役，美军代号为“苏格兰行动”和“飞马行动”，是越南战争中爆发于南越广治省西北部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时间为1968年1月到4月。——译者注

2 德浪河谷，德浪河谷战役是越南战争中美越第一次交锋。——译者注

我很幸运能在美国海战学院 (Naval War College) 工作, 我的很多同事, 包括戴维·布尔巴赫 (David Burbach)、戴维·库珀 (David Cooper)、史蒂夫·诺特 (Steve Knott)、德里克·雷维隆 (Derek Reveron) 和保罗·史密斯 (Paul Smith) 等, 都提供了意见和资料, 但本书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我本人的, 不代表任何其他机构或美国政府部门的观点。

还有很多行业的朋友和记者也很好心地给我提出意见, 阅读其中的章节, 或是在我专业以外的领域为我解答疑惑, 包括安德鲁·法西尼 (Andrew Facini)、罗恩·格拉涅里 (Ron Granieri)、汤姆·汉格威尔德 (Tom Hengeveld)、丹·卡泽塔 (Dan Kaszeta)、凯文·克鲁泽 (Kevin Kruse)、罗伯·米基 (Rob Mickey)、琳达·尼科尔斯 (Linda Nichols)、布伦丹·尼汉 (Brendan Nyhan)、威尔·塞尔坦 (Will Saletan)、拉里·桑格 (Larry Sanger)、约翰·辛德勒 (John Schindler)、乔希·希恩 (Josh Sheehan)、罗伯特·楚毕什 (Robert Trobich)、迈克尔·韦斯 (Michael Weiss) 和塞琳娜·齐托 (Salena Zito), 尤其要感谢丹·墨菲 (Dan Murphy) 和乔尔·恩格尔 (Joel Engel)。我还要特别感谢戴维·贝克 (David Becker)、尼克·格沃斯德夫 (Nick Gvosdev) 和保罗·米都华 (Paul Midura) 为初稿和几番改稿提供的建议。

我很感激哈佛继续教育学院 (Harvard Extension School), 他们不仅给我机会授课, 还为教职员配备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担任研究助理。凯特·阿利纳 (Kate Arline) 就是我这个项目的助理, 她的作用不可估量: 她迅速应对了一些最古怪的问题, 而且镇定自若, 游刃有余。(想知道美国从 1959 年起开了多少家快餐店吗? 凯特会找到答案。) 不过, 书中如果有任何事实性错误或误解, 都是我个人的

责任。

写书对于作者来说是一段美妙而愉悦的经历，但对作者身边的人却不然。我的夫人琳恩和女儿霍普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总是很有耐心，对她们的无限容忍，我感激不尽。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她们。

最后，还有一些给我提供帮助的人要求匿名，当然，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诸多医学专家、记者、律师、教育家、政策分析师、科学家、学者、军事专家等分享他们的经历，给我提供了素材。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多少能在工作中帮到他们和其他专家。不过，说到底，所有专家的顾客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所以，我特别希望此书能帮助我的同胞们更好地利用和理解我们所依赖的专家。最重要的，我希望此书能为弥合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嫌隙略尽绵薄之力，长期看来，这样的嫌隙不仅威胁到亿万美国人的福祉，也会殃及美国民主试验的存续。

目 录

序 i

引 言	专家之死	001
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015
第二章	沟通这件事，怎么就变得如此累心	045
第三章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	077
第四章	我来帮你“谷歌”一下——无限的信息是如何把我们变愚蠢的	113
第五章	“新”新新闻学的种种	145
第六章	当专家错了	183
结 论	专家与民主	223

注 释 254

引 言

专家之死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¹

¹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年1月2日—1992年4月6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近500本，题材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与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并称为科幻历史上的三巨头，同时还与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并列为科幻小说的三巨头。同时也是著名的门萨学会会员。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大师奖。——译者注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1]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2]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

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